

[柒]

九说中国 ⑨

夏德元 著

寓言

里的中国



九个维度 九例个案
勾勒中华民族的
伟大文化传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寓言里的中国

夏德元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寓言里的中国/夏德元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7

(九说中国)

ISBN 978-7-5321-7252-8

I. ①寓… II. ①夏… III. ①寓言—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第118586号

发行人:陈徽

策划人:孙晶

责任编辑:余雪霁

封面设计:胡斌工作室

书 名:寓言里的中国

作 者:夏德元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168 1/32

印 张:8.375

插 页:2

字 数:116,000

印 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 978-7-5321-7252-8/G · 0244

定 价:27.00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39-2925888

九

九说中国

出版者的话

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持续发展到目前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发源于中国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壮大，立足于这片土地，敞开胸怀接纳吸收来自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元素，并不断向周边国家乃至全球传播，在对外交流中又进一步得到完善，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的文化面貌，也塑造着我们华夏民族优秀的精神品格。

对这样的文化，我们完全应该有充分的自信。而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为此，我们决定组织编写这套“九说中

国”丛书。

“九”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在古时，九为阳数的极数，又是大数、多数的虚数，所以，既可以表示尊贵，也可以代表全部。据《尚书·禹贡》所载，大禹治水，后来称王，将天下划分为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后来，九州可以代指整个中国。青铜器有“九鼎”，成语“一言九鼎”表示说话有分量。“九”还与“久”谐音，有长长久久、绵延不绝之意。

“九说中国”系列丛书在体例上力图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历史分期，从文化表现的角度着眼，系统展示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元素与基本样貌，凸显中国思想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精神的丰富多彩，进而揭示华夏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和深刻内涵，展示华夏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强大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需要创新性发展；转化与发展最终一定是从实处、细微处生发出来。“九说中国”系列丛书邀请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

从承载中华优秀文化的诸多细小的局部和环节入手，从最能代表中国气质、中国气象、中国气派的人物、事物、景物、风物、器物中，选取若干精彩靓丽的内容，以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描述华夏传统的不同侧面，向读者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九说中国”系列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每辑九种。第一辑九种书目，涉及文字、诗歌、信仰、技术、建筑、民俗日常，并推究建立于其上、传承数千年的华夏观念。为了让海外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本丛书在适当的时候还拟推出多种语言的国际版。

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九说中国”系列丛书力求涵盖面广，兼顾古今，并恰当地引入中外比照；做到“立论有深度，语言有温度，视野有广度”，同时用当代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加以呈现。

当然，丛书的编写是否达到了策划的预期，还有待读者诸君评鉴。欢迎各位随时提出批评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写在前面

寓言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中的一棵常青树。

根据寓言史学家陈蒲清教授的观点，寓言产生于人类告别原始时代而进入文明时代之际，迟于神话与原始歌谣。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巴比伦文明，发源于恒河与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发源于黄河与长江的古中国文明以及巴比伦文明之前的苏美尔文明，都创造了寓言；略后的古波斯、古希腊、古希伯来，也创造了寓言。

中国文化有考古证据和史料记载的文明时代，至少从五帝时代开始，距今大约五千年到八千年；而有确切

文字可考的历史，自商代至少也有三千六百年。如果从寓言产生的条件进行演绎推理，那么，中国寓言应该在夏王朝时代就产生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流传到今天的夏王朝时代的寓言。陈蒲清教授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早期的寓言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个解释的事实依据是，世界早期寓言都往往以拟人化的动物故事为题材，而中国现存的古代寓言极少有拟人化的动物故事。不过，笔者并不完全赞同陈教授的解释。从人类文明自非洲大陆、地中海、中东亚、印度、中国的传播路径看，中国文明的兴起晚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加之各种文明在相对分隔的地域独自发展出各自的特色，从而思想成果和文学创作略有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古代寓言见于书面记录的时代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萌芽于《周易》中的卦爻辞，那大约是公元前 11 世纪的作品；第二种说法是，萌芽于《左传》所记载的公元前 6 世纪的几则故事；第三种说法是，《墨子》（前 4 世纪）中的寓言是中国最早的寓言。不论认同

哪一种说法，中国寓言与西方寓言的差别都是明显的，即中国寓言很少有拟人化的动物故事，而是多以人事为主角。其实，这是因为在寓言兴盛时期的中国哲人们，已经形成了有别于古希腊哲人关注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专注人与神的关系大异其趣的思想主题——人与人的关系。而这样的思想传统也肯定不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而是经过了远远超过文字可考历史的漫长的积淀过程。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两种风格有什么优劣之分，事实上，经过此后东西方文化漫长的交流融汇，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慢慢地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显了。现如今，以“农夫和蛇”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寓言和以“盲人摸象”等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早已和“滥竽充数”等中国寓言一样，成为我们的孩子百听不厌、耳熟能详的益智故事。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中国寓言有西方寓言不可比拟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厚度；因为它直接以人物为主角，以人事为故事的主干，所以让人读起来更感觉亲切自然，也更能心领神会。

不仅如此，中国人物寓言与中国人本文化的向构关系，还使得许多寓言故事后来都浓缩为成语典故，毫无障碍地融入了历代作家的经典创作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交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寓言史，就是一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寓言，是一座蕴藏丰富的人文宝库。作为一种成熟独立的文学体裁，寓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寓言在塑造民族灵魂、提高民族思维素质、繁荣民族文化、丰富民族语言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寓言，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质和创造力量，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个人修身养性、弘扬传统文化、重塑民族形象的宝贵借鉴。

那么，什么是寓言呢？中国古代，寓言的最早称谓是“譬”或“喻”。“譬”或“喻”，又合称“譬喻”：古人认为，用故事作比喻就是寓言。如：《墨子·鲁问》用“譬有人于此”开头讲述寓言故事，《孟子·梁惠王上》用“请以战喻”开头讲述寓言故事。汉魏人翻译《佛

经》，也称寓言为“譬喻”，如：《譬喻经》《百喻经》等。而“寓言”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庄子》的《寓言》篇和《天下》篇。《庄子·寓言》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的这八个字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揭示了寓言的一个本质特点。“藉外论之”，即假托另外的事情来说理，就是寓言的寄托性。第二，揭示了寓言的说服力。晋朝郭象注释《庄子》的“寓言十九”说：“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唐朝成玄英《庄子疏》说：“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已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也。”只可惜，庄子并没有给寓言下严格的定义，也没有举出明确的例子。不仅是最早使用“寓言”一词的庄子，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人给寓言下过明确的定义。

直到现代，人们才在各类工具书中给寓言下了定义。比如，《辞源》说：“寓言，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后称先秦诸子中短篇讽谕故事为寓言，因为文体之名。”《辞海》则说：“寓言，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谕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

可以是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得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给寓言下的定义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这类作品通常为散文体写的简短故事，有时也采用诗体形式，大多具有讽刺、劝谕或教训的寓意，因而称为寓言。借喻是寓言的重要特点，它向读者暗示寓言所蕴含而未直接表露的思想……”

在对这些定义进行辨析之后，陈蒲清教授在《寓言传》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他解释说，“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这个定义，概括了寓言所具有的两个要素：“故事性”和“寄托性”——寓言必须是一个故事，不是一般地抒发见解，而是通过故事抒发见解；所谓“作者另有寄托”，就是说作者讲这个故事时，不限于故事本身的意义，而是另有所指，寄托了另外的含义，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寓言的故事就是寓体，寓言的寄托就是寓意。这两者缺一不可。寓言必须既有“故事性”，又有“寄托性”，这是确

定寓言的必要条件。否则，就不是寓言。没有故事性只有寄托性的作品，它就是作者直接抒情或说理的诗文。反之，没有寄托性只有故事性的作品，它就是一般的叙事作品，包括没有寄托性的小说、叙事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既有“故事性”，又有“寄托性”，也是确定寓言的充分条件。任何一件作品，只要同时具有“故事性”与“寄托性”，它就是寓言。（陈蒲清著：《寓言传》，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363—364页）

中国古代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寓言作家，他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寓言风格，开拓了广阔的题材天地。与西方寓言和西方寓言概念相比，中国古代寓言都有着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如前所述，与西方寓言“特别爱用动物形象，并试图给人以道德的训诫”（《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不同，中国寓言多以人物为主角，很少用动物故事来寄托寓意；或即使有动物，也是与人物伴随出现，并作为人物的配角。中国寓言的这一特点，使它更平易近人，更能在各种文体中自然出现，并与文章融

为一体，给人潜移默化的教益。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寓言的这一特点，所以它散见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中，不易被人重视，也使后人的钩辑整理更加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批流传至今且寓言又比较集中的珍品。比如在《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说苑》《新序》《笑林》《柳河东集》《艾子杂说》《郁离子》《燕书》《龙门子凝道记》《贤奕编》《雪涛小说》《笑赞》等书中，就存有大量的优秀篇章，即便仅以上述诸书为凭，亦足见中国古代寓言之蔚为大观。

中国古代寓言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陈蒲清教授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陈蒲清著：《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根据寓言本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把中国寓言史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寓言、两汉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寓言和元明清寓言。这五个发展阶段，同时也代表着五种寓言风格或主潮。先秦寓言多集中在诸子散文中，一般为阐述各学派

哲学政治主张服务，可称为“哲理寓言”；两汉寓言题材和手法大多因袭先秦，但主旨是为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即希望通过寓言来宣传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人以劝诫，可称为“劝诫寓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哲学、文学、艺术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寓言的创作也是这样。这个时期印度寓言随佛经传入我国，对此后中国的寓言创作输入了新鲜血液，并进而演化为中国寓言传统的一部分；唐宋寓言是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继先秦之后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讽刺性加强而哲理性减弱，可称为“讽刺寓言”；元末和明中叶以后，又掀起过两次寓言创作高潮，其特点是冷嘲热讽的笑话成分增多，其中大多数可称为“诙谐寓言”。

我基本认同陈蒲清教授关于寓言的定义和对中国寓言史的分期，并按照这个定义和寓言发展史的大致脉络，从九个角度选取中国古代寓言若干则，加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通俗解读，试图展示寓言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品格和中华民族独特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从叶公好

龙到画龙点睛、从守株待兔到按图索骥、从杞人忧天到愚公移山、从庄子寓言到艾子杂说、从歧路亡羊到塞翁失马、从掩耳盗铃到螳螂捕蝉、从狐假虎威到黔驴技穷、从南郭先生到东郭先生、从南橘北枳到病梅馆记，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寓言宝库来说，这肯定是九牛一毛、挂一漏万；但是，笔者试图在丛书“九说”的框架下，尽量选取最富有代表性的寓言精品佳作，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中国寓言作家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智慧闪光，以期给读者提供“窥一斑而知全豹”的阅读体验，并产生对中华文化理解基础上的认同和认同前提下的反思，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积蓄新的精神能量。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本书除收录了“正宗”的中国寓言之外，还特意选收了备受鲁迅先生推崇的《百喻经》故事，不只因为它精彩，更因为这些故事在“中国”寓言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是这些故事在随其他佛教典籍一道被译为汉语文之初，就已经过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改造；二是这些故事一经传入，就对中国本土的寓言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并逐渐演化为中国寓言传统的